

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

(苏)普·季·雅科夫列娃 著

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

〔苏〕普·季·雅科夫列娃著

贝璋衡译

本书为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注明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3年·北京

П. Т. Яковлева
**ПЕРВЫЙ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ДОГОВОР 1689 ГОДА**
Изд. АН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58

2302/14

内部读物

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

[苏] 普·季·雅科夫列娃著

贝璋衡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人民路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7 1/4。 200 千字

1973 年 12 月第 1 版 197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17·327 定价: 0.73 元

序 言

雅科夫列娃的《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1958年出版于莫斯科。它是苏联出版的讲《中俄尼布楚条约》的一本专著。其中叙述了十七世纪中俄两国早期关系的历史和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两国使团在尼布楚举行谈判，划分中俄两国东段边界的情况。

本书作者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上，在书中竭力美化沙俄政府的殖民扩张政策，为老沙皇侵略我国黑龙江流域辩解，对中俄关系的早期历史进行了大量的歪曲和篡改。

作者在书中胡说，黑龙江流域从来不属于任何国家，而是俄国人在十七世纪新发现的土地，首先开发了它。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黑龙江流域历来属于中国。这是历史常识。远的不说，早在八世纪上半叶，中国唐朝就在黑龙江流域设有行政机构。十五世纪初，中国明朝在西起鄂嫩河，东至库页岛，北达乌第河，南濒日本海的广大地区建立了都指挥使司、卫、所等各级行政机构几百个。十七世纪上半叶，满族成为中国的统治民族，中国清朝继续对这一地区行使管辖，设官镇守，征兵收税。这些事实，不仅中国史书有大量记载，就连本书作者引用的俄国档案材料，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在本书中作者就明明写着：当沙俄入侵者窜到黑龙江流域，强迫当地居民向沙皇缴纳贡赋时，当地的达呼尔人酋长就曾明确地告诉他们，“‘博格德皇帝’（指清朝皇帝）的人已经向他们征收过毛皮实物税了”（见本书22页）。可见，在沙俄殖民主义者入侵黑龙江流域以前，这块土地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不容篡改的历

史事实。

作者还在书中颠倒黑白地指责中国军队对黑龙江地区进行了“军事远征”，是“绝对的侵略”，并大加渲染尼布楚条约是在“清政府对俄罗斯使节团施加军事压力的情况下缔结的”。

首先，如上所述，早在八世纪，中国就在黑龙江地区行使了有效的管辖。而那时俄罗斯还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只是到了十七世纪中叶，沙皇俄国的一小撮殖民主义者才万里迢迢，从欧洲跑到亚洲，窜到黑龙江流域来。所以进行了“军事远征”的不是别人，正是沙俄自己。

其次，在十七世纪下半叶中俄两国在黑龙江地区的几次冲突，是由于沙俄殖民主义的入侵所引起的。沙俄入侵者所到之处，用武力强迫当地中国居民缴纳贡赋，烧杀抢劫，无恶不作，干下了种种骇人听闻的暴行。中国各族人民和清军一起对入侵者进行坚决抵抗，是理所当然的，是正义的自卫行动。正是由于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和反侵略战争的节节胜利，以及俄国国内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各种困难，才迫使沙皇政府坐下来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如果把中国人民对入侵者的抵抗，称之为“绝对的侵略”，那岂不是完全颠倒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性质吗！

第三，所谓尼布楚条约是俄国在中国的“军事压力”下被迫签订的。这是无中生有的捏造。事实上，在尼布楚谈判期间，中俄双方所带兵力大体相当。至于双方所带卫队，那是根据协议，其数量是相等的，而且都不带作战武器，所以，根本谈不上中国对俄国“施加军事压力”。确凿的事实倒是清朝政府由于当时需要应付国内事务，稳定北部边界，宁可割让尼布楚，也想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至于俄国使团后来同意归还雅克萨，这是在订约之前早已在俄国政府给其使团的秘密训令中规定了的，是沙皇的既定方针（见本书139、149、153页）。正象作者在书中不得不承认的那样，俄国使团

在谈判桌上所同意的,不过是“在他们所奉的敕令中是预先规定了的:即放弃阿尔巴津,讨论以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以及沿斯塔诺夫山脉以至于海为界的问题”(见本书 182 页)。由此可见,尽管中国让了一些地方,但谈判是在平等基础上进行的,条约基本上反映了两国政府的主张,符合双方的利益。对于这一点,就连本书作者也不能完全否认,她在本书结论里写道:“俄罗斯同中国的尼布楚条约是按照平等原则签订的”,“是互利的”(见本书 214 页)。

尼布楚条约是中俄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它明确规定了两国的东段边界,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订约以后,大约一个半世纪之久,中俄两国政府都承认并基本上遵守了这条边界线,保持了边界的和平与安宁。

这本书里还有其他许多荒谬的论点和歪曲的叙述,需要详细地、深入地进行批判。这些谬论并不仅仅是作者的个人观点,它继承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帝俄时代的殖民主义历史观点。而今天,社会帝国主义者则更加发挥了这些观点,为其侵略和扩张主义政策服务。尽管如此,但书中引用的某些具体史料,对我们研究十七世纪早期中俄关系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庆 思

1973 年 10 月 15 日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俄中关系的起源	11
第一节 俄罗斯向太平洋沿岸的伸展	
沙皇政府对东西伯利亚的政策	11
十七世纪阿穆尔河流域的居民	14
俄罗斯对外贝加尔地区和阿穆尔地区的开发	40
十七世纪达呼尔地区的俄罗斯移民	51
俄罗斯与蒙古诸汗国的关系	73
第二节 俄罗斯同中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的发生	83
初期派往中国的俄罗斯使节团	93
十七世纪的俄中贸易	115
1683—1689年满洲军队和俄罗斯哥萨克	
在阿穆尔地区的冲突	118
第二章 尼布楚条约的酝酿和签订	131
第一节 使节会议的准备,双方使节团的人员、	
权限和所奉的训令	131
俄罗斯使节团	131
柯罗文对使节会议的准备活动	141
清朝的使节团	156
中国使节 1688 年从北京的出发	160
第二节 俄中两国在尼布楚的谈判	166
1689 年 8 月 12 日使节们的第一次会议	166

1689 年 8 月 13 日使节们的第二次会议,使节谈判的 破裂和尼布楚的被围,通信的谈判	171
1689 年 8 月 27 日使节们的第三次会议	189
第三节 1689 年的尼布楚条约,条约的内容和 历史意义	193
结论	213
附录一 中俄尼布楚条约	216
附录二 费·阿·柯罗文通行证	219
附录三 费·阿·柯罗文等使节全权证书	221
参考书目	223
俄汉译名对照表	229

前 言

本书的基本任务在于阐明第一个俄中条约的历史先决条件以及这个条约的内容和性质。关于初期的俄中关系这一重要课题，直到现在无论在中国或苏联都还没有专门的论著，所以急需研究这个问题是非常明显的。由于缺乏以原始档案为根据来分析尼布楚条约的专门著作，以致关于条约内容以及俄中开始发生关系时期的整个历史产生了矛盾的而且往往是不正确的解释。

革命前的研究者，包括对俄国与东方各国的交往史写过概述性著作的尤泽弗维奇^①、特鲁谢维奇^②和姆·伊·文纽科夫^③在内，都不重视尼布楚条约，而仅限于单纯把事件列举出来。从米勒开始，某些历史家在谈到 1689 年条约时指责俄国使节团把阿穆尔河^④让给了中国，对俄国与中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做了否定的评价^⑤。

在苏维埃时代，历史家库尔茨^⑥毫无根据地贬低尼布楚条约

① 格·尤泽弗维奇：《俄国同东方的政治和贸易条约》，莫斯科 1869 年版，第 234—236 页。

② 赫·特鲁谢维奇：《十九世纪前俄国同中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莫斯科 1882 年版，第 29—33 页。

③ 姆·伊·文纽科夫：《俄国同中国签订的旧条约和新条约》，圣彼得堡 1863 年版，第 1—10 页。

④ 阿穆尔河即黑龙江。——译者

⑤ 参看格·米勒在《……每月论文集》中发表的文章，1757 年第 7、8、9、10 号；弗·普·瓦西利叶夫：《中国的发现》，圣彼得堡 1900 年版，第 68 页；恩·弗·丘涅尔：《远东各国近代史》，第 3 卷，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译者）1910 年版，第 23—29 页；尤·巴尔捷涅夫：《阿尔巴津的英雄们……》，《俄罗斯文献》，1899 年，第 2 号。

⑥ 勃·格·库尔茨：《十六至十七和十八世纪的俄中关系》，哈尔科夫 1929 年版，第 50—55 页。

的意义,硬说:“实际上条约并未实行。国界在事实上并未划清,因此重新发生误会;……莫斯科政府对自由贸易的远大希望始终只是希望,因为第一,中国人不认为同俄国进行贸易是重要的,第二,他们根本不允许外国人到他们那里去自由贸易。”^①

在萨文的概论性的《沙俄和苏联同中国的相互关系》一书中,重复了旧日对耶稣会教士的恭维,仿佛是他们第一个俄中条约的缔结中起了主要作用。萨文对尼布楚条约没有做广泛的注释。^②

1940年德国传教士瓦尔特·福克斯在北平发表过一篇很慎重的论文,这篇论文具有一定的意义。^③作者注意到,在欧洲、中国和日本对尼布楚条约的内容都非常关心,所以他决定把这个条约已有的满文、中文、日文、俄文、法文、德文、英文以及荷兰文各种版本加以系统的整理和研究。^④福克斯的结论归纳起来是这样的:

1. 尼布楚条约的种种欧洲版本,都根据张诚^⑤从拉丁文翻译的法文本,即大家都知道的迪·哈尔德版本。^⑥福克斯认为,张诚的翻译以及从而派生的一切译本都存在着严重的不准确性。

2. 所有中文、满文和日文的版本也不是以原本为根据,而是

① 勃·格·库尔茨:《十六至十七和十八世纪的俄中关系》,哈尔科夫1929年版,第50—55页。

② 弗·普·萨文:《沙俄和苏联同中国的相互关系》,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年版。

③ 瓦尔特·福克斯:《对1689年俄中尼布楚条约文本的考证》,载辅仁大学东方研究学报《中国文献》,亨利·维琪,北平,1939—1940年,第4卷,第546—593页。

④ 福克斯,论文同前,第547—548、569—571页。

⑤ 法国来华的传教士,曾在尼布楚谈判中充任清方的译员。——译者

⑥ 耶稣会教士迪·哈尔德:《中华帝国和中国蒙古地理、历史、编年史、政治与自然状况的概述(附各该地区全图和分图以及西藏、朝鲜全图和分图)》(法文版),第4卷,1736年,第147—161页。

以译本为根据的,因此它们也含有许多错误和重大分歧。

3. 北平的档案库中没有 1689 年条约的原本本,所以难以判明条约的确实内容。因此福克斯声明说,他不知道尼布楚条约的档案材料。^①

福克斯的结论证明,如果不引用保存了满文和拉丁文原本的俄罗斯档案材料,就不可能稍稍充分地研究俄中两国的关系史和判明第一个俄中条约的确实内容。

对俄中关系发展的开始阶段的研究所以复杂,首先是由于关于这个问题缺乏发表过的中国文件。^②目前仍不清楚中国的档案馆里是否保存有这种文件。至于俄国方面的材料,那末在苏联的档案馆里是保存有很多很多的。

本书是以分析苏联档案馆里保存的,几乎未曾研究过的原始文件和材料为基础,来研究促使俄中发生关系的一般先决条件以及尼布楚条约的酝酿和签订经过的初次尝试。作者没有可能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库的材料,自知本书的缺点在于史料根据带有某种程度的狭隘性和片面性,但作者认为俄国档案材料为具体地、基本上正确地阐明尼布楚条约的酝酿和签订经过提供了可能性。

在写作过程中利用了莫斯科的中央国家古代文件档案馆和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的档案;还引用了列宁格勒中央国家历史档案馆所保存的第一届西伯利亚委员会的材料。外交事务衙门(十七世纪主管俄国对外政策的机关)的文件对这一问题有巨大的意义。外交事务衙门的档案中有“俄中关系”档案或称“中国事务”档案。为这些材料做主要补充的,有管理整

① 福克斯,论文同前,第 547 页。

② 《故宫俄文史料》(北平 1936 年版)中只有两个十七世纪的文件(第 1、4 号)。(实际上该书中的第 1—5 号各件都是十七世纪的,不过只有第 1 件是签订尼布楚条约以前的。——译者)

个西伯利亚的西伯利亚事务衙门的文件（“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西伯利亚各地（雅库次克，伊尔库次克，尼布楚）将军衙门的案卷（第 1177、1121、1142 号档案）。在上述中央和地方机关的公文来往中，有十七世纪俄中关系和俄国在阿穆尔地区殖民的详细资料。

应当指出，必须引用俄国的档案文件来研究俄中关系的思想绝不是新出现的。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班蒂什·卡敏斯基就进行过巨大的工作来介绍俄中关系史方面的档案材料，他所著的《1619—1792 年俄中两国间的外交文件汇编》^①，是介绍所有发往中国的俄国使节团的文件内容和所有从中国发来的公文内容的一本宝贵而简明的参考书。

历史著作中也引用过记述初期派往中国的各次俄国使节团（伊凡·彼特林、费多尔·贝科夫、伊凡·佩尔菲利耶夫和尼古拉·斯帕法里^②各使节团）的档案材料。

阿尔先耶夫出版过尼古拉·斯帕法里出使报告的全文^③；在不同时期的出版物中，先后发表过关于彼特林和贝科夫使节团的文件。^④但是有关签订第一个俄中条约的柯罗文使节团的文件从来还没有发表过。本书中广泛利用了费·阿·柯罗文的出使报告（中央国家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 10 册）、使节团的日记（同前，第 13 册）以及费·阿·柯罗文将军行轅的案卷（中央国家古代文件档案馆，第 1121 号档案）。

西伯利亚事务衙门的档案中所保存的文件，对于尼布楚条约

① 恩·恩·班蒂什-卡敏斯基：《1619—1792 年俄中两国间的外交文件汇编》，喀山 1882 年版，第 6—66 页。

② 我国过去史书上的译法为“尼果赖”。——译者

③ 《俄罗斯地理学会会刊》，1882 年，第 10 卷，第 1 期。

④ 彼特林的出使报告载于《西伯利亚公报》1812 年第 2 期。又参阅斯列兹涅夫斯基《关于人们知道不多的和完全不知道的文献的介绍》，圣彼得堡 1874 年版。贝科夫的出使报告载于《俄罗斯人民的传说》，第 2 卷，圣彼得堡 1849 年版。

签订前俄中贸易的规模和性质提供了值得重视的具体资料，这些文件过去在历史著作中是未曾利用的，对这些文件的研究使我们首次有可能阐明 1657 年佩尔菲利耶夫使节团前往中国的经过和 1668 年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庞大商队前往中国的经过。

为了说明中国使节团及其权能和所奉的训令，本书除引用耶稣会教士张诚的日记以外，还充分利用了中国的关于 1681—1689 年康熙军队在阿穆尔河作战以及签订尼布楚条约的日志^①的译文。这是十八世纪初就由俄国人翻译过来的，现在保存在中央国家古代文件档案馆的《俄中关系》档案中(第 K-2 号, 1682 年)。这个文件相当详细地叙述了康熙皇帝对他的军事领袖和使臣的训令。这个日志的某些片段曾经发表过。^②

苏联科学院图书馆缮本室里(在列宁格勒)有十八世纪初绘制的阿穆尔地区和外贝加尔地区的平面图，熟悉这些图对于写作本书具有重要的意义。那里还保存有两本很有趣味和很有价值的手抄书籍，一本是《中国志十四章》(《乌斯丘格手稿汇编》，第 45 号)，一本是《中国历史》。前者是十八世纪初用半多角字体^③写的，用了五十五张厚纸。它是在 1783 年从大乌斯丘格城的大主教图书馆转移到科学院的。从内容来看，这本书描述的是清朝皇帝康熙统治时期的中国。作者是一个耶稣会教士，对十七世纪后半期中国历史的全部叙述都是以歌颂清朝皇帝的笔调来处理的。由于这本书包括有许多关于北京和康熙的详情细节，所以在以批判态度对待它的同时，还是值得加以注意的。

第二本值得注意的缮本书是《中国历史》。它的内容是尼古拉·斯帕法里对中国的记述。

① 指《平定罗刹方略》。——译者

② 《俄罗斯文献》，1899 年，第 2 期。

③ 即行书体。——译者

这本书有一百四十张纸,都是用很工整的字体写的,并有大量的脚注和引文,这些脚注和引文显然是一位中国通,即中文译员伊拉里昂·罗素新所做,是他对尼古拉·斯帕法里的记述的批评。^①

本书还利用了在《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补编》中所发表的文件。关于叶洛菲·哈巴罗夫 1649 年和 1651 年远征阿穆尔河的文件令人感到很大兴趣,这些文件为说明俄国在阿穆尔地区的政策提供了可能性。^②瓦西里·波亚尔科夫对于他的远征队航行到阿穆尔河的报告也是令人感到很大兴趣的。这个文件是对阿穆尔地区的自然界和居民最早的、而且非常详细的记述,因此波亚尔科夫的报告被当作了第一章中关于十七世纪达呼尔地区的自然界和居民那一小节的基础。^③

这些文献汇编里载有叶洛菲·哈巴罗夫向雅库次克将军所做关于 1641—1652 年俄国哥萨克在阿穆尔河的活动报告,还载有俄国哥萨克谢尔盖·安德列耶夫及其部下对于阿穆尔地区和中国报告,这些报告证明了中国满洲人统治者对俄国人的作战准备。^④其中还有叶洛菲·哈巴罗夫一个可贵的报告,他说“达呼尔地区除黑麦以外产粮很多”^⑤。

从阿尔巴津^⑥总管奥努夫里·斯捷潘诺夫和尼布楚将军伊拉里昂·托尔布津向雅库次克所做关于 1655 年满洲军队在阿穆尔

① 关于罗素新及其在中国的活动,我是以罗素新的亲笔传记为根据的,这个传记保存在列宁格勒的科学院档案馆里(第 3 号档案,目录 1,第 202 件,第 38 张)。罗素新证明,尼古拉·斯帕法里不仅不懂中文,而且对中国没有正确的概念。斯帕法里赞扬耶稣会教士们,而罗素新说耶稣会教士只是“用谄媚的手段取得了”某些中国人的信任,大多数中国人则要求把耶稣会教士从中国驱逐出去。

② 《历史文献》,第 4 卷,圣彼得堡,第 31 号,第 67—76 页。

③ 《历史文献补编》,第 3 卷,圣彼得堡,第 12 号,第 50—60 页。

④ 同上,第 103 号,第 371 页。

⑤ 同上,第 103 号,第 372 页。

⑥ 阿尔巴津即雅克萨。——译者

河进攻俄国库马罗夫斯克堡^①以及达呼尔人和久契尔人^②遵照满洲皇帝命令从阿穆尔河移居嫩江的报告中,判明了很重要的事实。这一事件的目击者斯捷潘诺夫明确地报告了这次迁移的经过是怎样的,他说:“……博格德皇帝^③的王爵沙尔呼达纵火焚烧和彻底破坏了他们的财物和帐篷……”^④尼布楚将军托尔布津报告说,达呼尔地区的俄国军职人员不足以抵御康熙的军队和蒙古人,但另一方面又有非纳贡的鄂温克人到尼布楚来,请求允许他们加入俄罗斯国籍。^⑤

来自雅库次克关于满洲军队围困阿尔巴津以及阿尔巴津的哥萨克出征根河的报告是值得注意的。根河那里居住着被强迫从阿穆尔河移去的达呼尔人,出征就是根据他们的请求而组织的。以尼基福尔·切尔尼戈夫斯基为首的三百名哥萨克答应去帮助达呼尔人,不过他们出征的结果没有下文。但这些文件对于判明阿穆尔河的达呼尔人和俄国人的关系是很重要的。^⑥

俄国传教士团成员卡法洛夫(帕拉吉)发表过俄文的《中国的〈圣武记〉》一书摘要(即关于清朝武功的记述),这本书是中国历史家魏源所著,对十七世纪中国的满洲八旗军的性质、数额和武装提供了很宝贵的资料。^⑦

魏源指出,俄国属地扩展到阿穆尔河,而中国任何人对阿穆尔河各部落的情况一无所知,“仿佛他们是居住在天边似的”,阿穆尔

① 《历史文献补编》,第4卷,第8号,第26—31页;第31号,第83—85页;第53号,第145页;第116号,第272页;第133号,第320—327页。

② 久契尔人(дючер)即女真族人。——译者

③ 博格德(Богд)蒙语,“神圣”、“至高无上”之意。博格德皇帝和博格德汗是对清朝皇帝的称号。——译者

④ 《历史文献补编》,第3卷,第31号,第82页。

⑤ 同上,第327页。

⑥ 同上,第6卷,第22号,第153页。

⑦ 卡法洛夫(帕拉吉):《中国的〈圣武记〉》一书摘要,北京1907年版。

河的索伦人和达呼尔人部落“不属于满洲部落”，达呼尔人和索伦人是在清朝时代(即康熙年代)被征服的。

魏源还说，满洲人的清朝蓄意在蒙古实行分裂整个地区的政策，以“削弱蒙古人的力量”。^①

*

*

*

为了正确理解十七世纪俄中发生关系的条件和性质，必须同时注意俄中两国的内部情况和国际形势。

列宁断定十七世纪在俄国历史上是一个新时期的开始^②，这个时期的实质他认为就是全俄市场的形成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国家经济大大发展的结果。俄国的征服西伯利亚是与俄国经济的发达和全俄市场的形成有直接关联的。列宁认为，俄国的征服西伯利亚是争夺经济领土。^③十七世纪俄国在欧洲实行着积极的对外政策，为了收复被瑞典、波兰和土耳其侵占的土地和打通海上出路而进行着斗争。在当时，这是俄国对外政策的主要方向。在远东，俄国努力争取同自己最大的邻邦中国保持持久的和平和相互的贸易。在十七世纪，和平和同俄国的贸易对于中国同样也是必要的。

按照马克思的论断，中国一直到十九世纪还是封建国家，所以它的居民只能有限度地同欧洲的资产阶级国家进行贸易。马克思在1858年写道，“……一般说来，人们过高估计了天朝老百姓的需求和购买力。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下，谈不上什么大宗进口外国货。”^④十七世纪中叶，中国被套上了清朝的沉重枷锁，清朝的对内和对外政策是与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格格不入的。

① 卡法洛夫(帕拉吉):《中国的〈圣武记〉一书摘要》，北京1907年版。

②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4页。(在这个版本里，“新时期”是译为“近代”的。——译者)

③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4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04—605页。

恩格斯指出，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清朝的对外政策一直是与中国人民毫无关系的，战争只是由皇帝的军队去进行，而中国“……人民静观事变……”。^①

两国的封建统治阶级领袖的主观见解和政策，对俄国同中国建立相互关系的过程发生了一定的影响。无论俄国的沙皇和外交家们或是清朝的皇帝及其大臣们，都是实行本国封建阶级的对外政策的纲领的，这就给两国政府的这些或那些对外政策的步骤打上了阶级局限性的烙印。不顾这种政策的致命后果而力图保证狭隘的、自私的阶级利益的倾向，在俄中发生关系的初期不止一次成为中国同俄国交往的障碍。中国皇帝康熙对俄国的政策是这方面的实例之一。康熙对俄罗斯国家的力量、性质和国际意义没有现实的概念。他力图以武力扩展自己的帝国，力图通过征服邻邦领土，包括俄国在阿穆尔河和东西伯利亚的领地在内来增加自己的臣民的数量。

康熙皇帝的对外政策使得用条约把两个邻邦的和平关系固定起来的工作遇到一些困难和麻烦，但这种政策并未能阻止两国的接近过程的实现，这种过程是由历史所决定的。

俄中两国外交关系的开端问题与俄国在阿穆尔地区的殖民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本书不能尽量充分而深刻地分析俄国在东西伯利亚殖民的整个复杂过程，但是对阿穆尔地区和外贝加尔地区的殖民事实也做了一般的概述，因为这些事实足以说明签订第一个俄中条约的经过。东西伯利亚以及阿穆尔地区在十七世纪的归入俄国版图，是农民开发这些人烟稀少的地区的结果。俄国人的建立农业、渔猎等业、各种手工业以及商业，标志着阿穆尔地区的生产力的大大向前发展。东西伯利亚的俄国农业移民对当地居民没有西欧殖民者固有的那种傲慢、轻视和仇恨的态度；俄国人不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31页。